

質性基礎設施，與物質性基礎設施具有同等重要性。

東亞的現代化應該超越西方模式的現代化，而不是抄襲西方的現代化。吸取和融匯現代西方機器文明的優秀成果，探索自己的發展道路，是第三世界的共同任務。這條新的發展道路的成功與否，將影響人類二十一世紀的發展前景。

在二十一世紀中，廣大的第三世界許多國家將全力以赴地進入工業社會，而高度發達的工業國家則將探索如何走出工業社會。世界處於兩種不同方向重疊的大運動之中。地球變得愈來愈小了。每個國家都將思索：它將如何在這個急劇變化的、分裂的、不平衡發展加劇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發展的平衡與重心。

如果認識到世界的新形勢，就請牢記住這句流行的西方名言吧：

考慮問題要胸懷全球，行動要始於足下。

羅榮渠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克服歷史

李弘祺

特羅慈（E. Troeltsch）說要「克服歷史」。我對於這樣的見解十分同情。實際上幾乎可以這麼說：我們一切困擾就在於我們有歷史的負擔。當然，特羅慈是感到文化紛擾，各有各的經驗和由經驗而累積的文化偏見，莫衷一是，這

才感到如果有一個可以宗仰的真理，那麼我們不就可以克服歷史了嗎？可是，正如審判耶穌的彼拉多說的：「真理是甚麼？」特羅慈希望尋覓到可以克服歷史的真理，這並不容易。

普朗布（J.H. Plumb）也談到「過去之死」（The Death of the Past）。他認為歷史學常為統治者服務，這樣的歷史應該讓它死去。歷史應該教導人智慧，讓人對自己有更正確的認識。可是，正如蘇格拉底說的「人是甚麼」。這是太大的問題了，普朗布對這個問題未必有答案吧！



我還是最喜歡巴柏（Karl Popper）所說的，歷史並沒有意義，他的意義端在於人如何去創造它。歷史本身並沒有規律。我們從它可以學到的頂多只是不重蹈覆轍而已，我們不可能希望自己的經驗可以使自己更善於應付新的挑戰。事實上，常常發生的是：我們的經驗往往不必要地束縛了我們應變的能力，造成陳陳相因的情境。

「克服歷史」的真義乃是從歷史中學到經驗的有限性和不可靠性，而不應當是依賴經驗。這話說來有點不正常，因為人不能沒有經驗。是的，如上面所說，經驗雖然能教我們免蹈覆轍，但它不能教我們應付新的挑戰。這就是經驗之不足、不可靠之處。

眾人經驗的總和便是文化。「文化」是很雅的字眼，令人十分嚮往。從前張蔭麟講到秦與中原有了交往以後，從此「雅化」了，實際上是說這才開始有了「文化」。每一個民族或國家都標榜自己的文化，把歷史和文化加以等同，目的是甚麼？普朗布已經講了。

實際上，不會有人說數學是一種文化的表現——當然，正如史賓格勒（Oswald Spengler）說的，不同的文化創造了不同的數學，然而，數學一旦創造了之後，它便超越文化了。

換句話說，文化是用來被超越和克服的。我們生活在一個曖昧混亂的世界，社會必須設計各種規範和準則來維持安定和和諧的秩序，宗教是這裏頭最明顯的例子，但許多不依傍宗教而存在的倫理、道德的信念，它們也一樣有效。

不管是宗教的或人文的，社會所抱持的信念和規範都不一定經得起理性原則或時間原則的考驗。理性的判斷原則並不容易取得，很多國家或社會因此訴之於時間的原則。大凡持之長久的生活信念和理想都可以認為是經得起考驗的，它們便成了文化，成了歷史的教訓，甚至成為自欺欺人的真理。

事實上，依傍國家機器而存在的文化最具有偏見（缺乏國家而猶能持續的

文化有如宗教，特別是猶太教），最好是希望能超越文化而成爲普世性、合理性原則的真理。

然而，在達到超過「時間原則」而臻於「理性原則」之前，人很難克服文化的偏見。特別是把文化和「大地」（領土）聯繫在一起的時候，對自己文化的執持就更爲「具體」了——目前的以色列便是如此。

在時間變動不居的歷程裏頭，社會必須依賴文化來運營，但這些只用時間原則考驗的東西並沒有達到黑格爾(Hegel)所說的“actuality”，因此都必然是短暫的，然而，人無法蔽於一己之偏，這就造成了紛爭。

討論國家及文化原則很深入的德國思想家認爲這些似是偏見的文化衝突，本身必然是合乎倫理原則的，因爲國家是最自然的、合乎倫理的實體。只要把國家和文化重疊混融，這就夠了。

這太樂觀了！我認爲還是要把國家當作是在「時間原則」下僅次於文化的最經得起考驗的實體，但文化和國家都是時間內的東西，都不是真理。

沒有經過理性原則驗證的東西，都是時間流裏頭的短暫過客，不能加以執持。

「克服歷史」的真諦就在於此。

李弘祺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高級講師